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吴泉成*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美国传教士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教会学校,招收学生,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体系,加速中国近代官办教育的发展;建立女子学校,发展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女性觉醒和解放运动;促进中国人留学海外,开启了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进程;因应洋务运动的需要,翻译大量西方著作,向中国引入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拓展了中国人“西学”的视野。

相比较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美国传教士走在了前面。1783年,美英签署《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到了19世纪初期,在大陆扩张主义和西进运动的推动之下,受孤立主义主导的美国主要在北美大陆进行由东向西的扩展,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扩张计划尚没有成型,只是跟随在英国等国家之后,如在鸦片战争之后,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由于美国早期对华关系起步较晚,也缺乏通晓中国事务的外交人才,因此较早来到中国且对中国情况有较深了解又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传教士就成为美国驻华官员的重点网罗对象。^① 随着传教活动的需要,部分美国传教士也乐于接受政府的任命,以帮助自己传教活动的开展。同时,这些人也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参与者,如美国美部会传教士何天爵曾是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四款》和《续约附款》的起草者。同时,由于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不断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并且把这些情况传回美国,成为美国对华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此外,美国传教士也推动了美国商业团体活动在中国的扩展。因为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外国商人在华的商业活动受到限制,而传教

* 吴泉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①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士则是清政府允许进入中国的,所以美国商业团体资助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包括创办报刊、建立学校、医院等,扩展其在华商业利益。^①不可否认,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符合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华的殖民扩张利益,起到美化美国殖民扩张的作用。但同时,美国传教士在华的一系列活动,特别是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创办女子学院、医学院等,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本文重点论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福音奋兴”运动,主张通过积极信主、做善行获得救赎,深刻地改变了大部分美国清教徒的观念,推动了美国基督教海外活动的开展。1830年2月,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到达澳门传教,揭开了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序幕。至1848年,在华美国传教士已经有70余人。^②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美国传教士加快了在华传教活动速度。到了19世纪末,美国西进运动接近尾声,而美国海外扩张主义兴起,作为显示美国力量和传播美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传教运动赢得美国社会各阶层的支持^③,使得美国在华传教活动迅速发展,加之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国与中国交往日益增多,美国在华传教士约在1500人左右。^④

美国在华传教的主要差会有:公理会,如最早来华的裨志文(1830),后来到的卫三畏(1833)和伯驾(1834)都是来自公理会;浸礼会,如叔未士(1836)和玛高温(1843),前者创办广州浸礼会支会,后者来华后受聘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长老会,如娄礼华(1842)和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杭州,1904年开始传教),前者是第一位来华的长老会传教士,后者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圣公会,如文惠廉(1837),是圣公会在上海传教第一人;监理会,如林乐知(1860)和潘慎文(1875),前者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后者主掌苏州博习书院。这些美国传教会以及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对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影响

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志文在广州创办了西方传教士在华的第一个教会学校——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开始了美国传教士在华教会教育的

①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98~101页。

② 参见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

③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9页。

④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进程。^①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外来传教活动的排斥,因而早期美国传教士在华通过创办教会学校、医院,免费吸收教徒子弟入学,免费提供医疗救治,一定程度加快了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扩展。此外,在近代中国提倡西学的影响以及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洋务学堂的推动下,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有了较快发展。美国传教士在华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小学、中学、大学和医院。据1912年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统计,小学有1992所,学生有44352人;中学和大学有285所,学生有23040人;医院有122家之多。^②

在这些学校中,教会大学和学院尤为突出。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私立学校“蒙塾”,1876年改为“登州文会馆”^③,采用正规的教学体制,这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教会大学,也开启了美国在华建立教会大学的序幕。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之前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1865)和度恩书院(1866)合并,改称为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从而出现了较早的一批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开设西方自然科学、法律、翻译、外语、医学和工程技术等课程,不同于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以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也不同于中国注重道德教化的宗旨。此外,在生源问题上,教会学校主张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学生不分贵贱。这相比较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注重培养少数男性知识分子更具进步性,也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多的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当中很多人拥有高等学历,如威廉·布尔克拥有神学博士学位,任东吴大学圣经学院院长。这些传教士将美国大学的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引进中国,加之这一时期在维新变法的影响之下,以及在西学和西式教育更加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大背景下,进而掀起了美国传教士在华建立大学的又一次热潮。到新中国建立前,美国传教士在华或是合并,或是新建,一共有13所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观念,而是以欧美大学教育体系为蓝本,采用西式的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学内容,以培养近代人才为目标,更为适应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需要。

美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及其建立教会大学,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自身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1862年,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清政府建立京师同文馆(1862),之后又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这三所外语学

① 参见董雪梅:《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理论学刊》2006年第7期。

② 参见 H. T. M. Bell & H. G. W. Woodhead, *The China Year Book*, 1913,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14, p. 440.

③ 1882年,美国纽约长老会正式批准为 Tengchow College,即登州学院。



校具有近代中国官方性质,陆续聘用美国传教士为教习,如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他们引入代数、几何、天文学和机械学等学科,开设科学实验课程,等等。由于自身传教士的身份,不可否认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弊端,但是这些传教士把欧美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内容引入中国官办教育体系中,推动了中国官办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清末维新变法之后,晚清政府陆续创办了北洋大学堂(1895)、南洋公学(1896)、四川中西学堂(1896)、京师大学堂(1898)、山西大学堂(1902)等近代新式高校。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变法失败,政府并没有给这些大学堂以足够的投入。加之在华的教会学校和传教士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政府的认可,这些官办大学堂或是采用西式教学方法和内容,或是直接聘用传教士为教学督管,如北洋大学堂聘用公理会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为总教习。丁家立在担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期间,大量聘用美国传教士任教,以美国大学为蓝本,采用四年学制,开设工程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等课程。南洋公学则聘用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为监院,负责督查公学的教务工作。他不仅聘用美国人为教师,还设立大学部、商科等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

此外,在教会学校和中国官办学校以及洋务运动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留学潮,特别是赴美留学生与美国传教士有着很大的联系。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容闳赴美国求学,在其归国后又促成了清政府于1872~1875年派出四批幼童赴美留学,等等。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唐绍仪(第三批,曾担任外交总长)、刘玉麟(第四批,曾担任驻英公使)等归国后进入中国外交部门,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在清末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竭力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①;詹天佑(第一批)修筑京张铁路,推动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吴仰曾(第一批)、邝荣光(第一批)、唐国安(第二批)等回国后从事地质矿产业,促进近代中国的地质学的产生和发展。蔡绍基(第一批)回国后不久担任北洋大学堂校长,仿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创立学校教育体系、教学规章制度,使北洋大学堂有“东方康奈尔”之称,而且他还送多名学生到国外留学,如促成王宠惠等人到耶鲁大学留学。这些留美幼童学成后把欧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等带回国内,既促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又带动了其他领域的近代化进程。更重要的是,归国留学生也成为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① 参见茆诗珍:《留美幼童对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二、对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将西方的教学制度、模式、文化引入中国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如女校、女塾和女子学院,这在中国封建时期是没有的。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对女性要求“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女子进入学堂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的妇女觉醒和解放运动中,来华传教士的教育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世纪40年代,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阿尔德赛小姐在宁波创建女塾学校^①,开启了近代中国教会创办女子学校的先河,中国女性学校教育由此开始。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女性学校,较早的有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次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在上海创办文纪女中。1861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学”。

由于中国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歧视,也没有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传统,加之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早期一些传教士在华的恶劣行径,造成中国民众对教会女子学校的猜忌,所以这一时期很少有中国家庭愿意将女孩送入教会在华女校,因此这一时期教会女校往往采用免费入学、提供吃住、发给生活费来吸引学生。然而,即使如此,学生数量依然不多,而且大部分学生来自生活贫苦的家庭,文化水平不高,因此这一时期的教会女校教育处在初级水平,学校教育只起到启蒙和扫盲作用。

洋务运动中后期至维新变法时期,西学之风日盛。或是受差会派遣,或是随其丈夫而来,大量美国女传教士进入中国,到1890年,女传教士占到美国传教士人数的60%。^② 这些女传教士以“妇女工作为妇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为其传教活动的动力,大部分人拥有高等学历且多数人来华后从事教育活动。在这些女传教士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教会女子中学。1872年,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那夏理在广州创办真光女学。1881年,裨文和文纪两所学校合并为圣玛利亚女中。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1892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设中西女塾,等等。随着教会女校数量增多,进入学校的女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学校生源也不再仅仅局限在社会底层,很多富家女

^① 前身为宁波女塾,后为宁波甬江女中。

^②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xiii.



孩也进入学校学习。到了19世纪末,中国进入教会女校的学生达到3819人。^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传教士创办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中国又出现了一批女子教会大学,如在“贝满女学”基础上建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后并入燕京大学),还有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女子大学(1915,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等合办,后并入南京大学)。此外,还有些教会大学是男女同校,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等。这些教会女校的出现,使中国女性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推动了中国近代女性的解放运动。

与此同时,教会女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如林乐知创办的中西女塾,其办学方针是“中西并重,不事偏枯”,开设数学、化学、英语等课程。还有很多女子大学开设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体育等课程,有些还开设医学、护士和职业教育等课程,培养了大批新式女性人才。如女传教士那夏理创办的真光女学,培养了广东近代第一批女教师、女医生和女护士,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此外,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如禁止女性缠足。1864年,“贝满女校”要求学生入学不准缠足,之后其他教会女校也陆续开始效仿。

一些传教士在进行中国传教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女子教育,林乐知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痛斥中国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国政何以必愚民,民日愚则为君上者易于压制其下;家政何以必愚其妇女,妇女日愚,则为男子者易于压制其妻”^②,他提出,中国“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行女学,女子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③。由于林乐知在华时间较长,且积极推行西学,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很大程度受其影响。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倡议之下,于1898年仿林乐知在上海的中西女塾而成立正经女学,这是晚清中国人自办女校的开始。该校不仅在学制和课程内容上采用教会学校的,而且还聘请上海几所教会女校如中西女塾、贝满学校和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生任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教会女子学校和晚清自办女校发展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女留学生。如:金雅梅,早年留美学习医科^④;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是

① 参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②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10集,上卷,光绪二十九年(1903)排印,第33页。

③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10集,下卷,第10页。

④ 金雅梅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女留学生。其早年进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北洋女医院院长,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参见褚季能:《甲午战争前四位女留学生》,《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1号)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在美国传教士布尔克的推荐下,就读于佐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也有些女校因开设和重视英语课的学习而出现多名女留学生,如中西女塾,其早年毕业生34人中,留美者达20人,1916年毕业生中考取清华留美者9人。1920年,中国政府公派29名女学生赴美留学,其中13人来自中西女塾。^①所以,教会女校对中国近代女性解放、接受近代新教育是有很大进步作用的。

三、对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兴起的,“中体西用”是其指导思想。但是由于明清时期的闭关政策,造成中西方长期隔绝,洋务派想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较为方便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语言和翻译西方书籍。此外,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创办的教会学校的影响不断扩大,使传教士成为洋务派学习西方和了解西方的仰仗。虽然传教士不赞成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因为在他们看来,“中体西用”体现了中华优越论。^②但是,西方传教士也看到洋务运动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依靠传教士所带给他们的机会。

较早的中国近代官办且影响力较大翻译机构有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后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和广州同文馆(1864),此外,还有益智书会(1877)、广学会(1887)等。这些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聘用传教士为教习,招收部分学生,同时传教士又翻译西书。由于中国人不通西文,所以翻译工作上由传教士负责,中国近代较为有名的美国传教士有丁韪良和林乐知。丁韪良于1869年受聘于京师同文馆,任职30余年。在其任职期间,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八年教学计划,如重视英语教学,要求学生第二年就要开始练习翻译,第五年就要练习译书,等等,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语教习和翻译,如汪凤藻、左秉隆、蔡锡勇、张德彝等,他们留在馆中担任副教习职位,从事英语教学活动,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英语教学的发展。^③同时,丁韪良也翻译了多本西书,如《万国公法》和《英文举隅》等。前者是国际法专著,为近代中国引进国际法学科,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概念,进一步推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运动。后者则是英文文法著作,为培养翻译人才起到重

^① Warren Candle, Young J. Allen, *The Man Seeded China*, Nashville, Tenn.: Cokesbury Press, 1931, p. 156.

^② Alice Gregg, *China and the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p. 44.

^③ 参见丁伟:《我国英语教学本土化的探索者——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要作用。此外，丁韪良还翻译了科学著作，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电学入门》等，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科学知识奠定了基础。

林乐知是近代中国另一位著名的从事翻译的传教士。1863年，林乐知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868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林乐知又兼任江南制造总局教习，之后创办中西书院和《万国公报》等。他在华期间，一方面在教育上，形成初级、中级到大学的“三级教育体制”，重视英语学习，要求学生在第二年就要开始学习翻译；重视中国近代女性教育，创办中西女塾。此外，林乐知翻译了大量著作，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列国岁政计要》《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等，这些译著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了解西方和西学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其他美国传教士在翻译西书。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来华后不仅创立博济医院，而且编译《眼科撮要》《内科阐微全书》和《西医内科全书》等30余种西医书籍，不但培养了近代中国自己的西医人才，更是推动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翻译了《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也把西方地质学引入中国，为我国地质学和矿物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翻译《最新微积分教科书》，把微积分引入中国，等等。出于洋务运动的需要，以美国传教士为主体，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同时又向中国引入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结 语

不可否认，美国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有着其自身的目的性和局限性，部分美国传教士也参与到美国对华侵略活动中，如美国美部会传教士伯驾在中美《望厦条约》谈判中帮助美国教会获得在华通商口岸设立教堂的权利；同为美部会传教士的卫三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秘书兼翻译，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谈判中，不断叫嚣对华使用武力；美以美会传教士卫理更是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美国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有着其积极影响的一面。传教士通过其教会学校把欧美的教学模式、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移植到中国，建立了包含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涵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校体系；倡导兴办女学，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翻译书籍，开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视野，等等，把欧美的近代教育理念、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不仅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还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